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文明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后，中国向世界提出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为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注入了强大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在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实现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对于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全球文明倡议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

从文明的多样性而言，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是文明需要交流互鉴的前提基础。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虽有差异，但不是“唯我独尊”，而是多样平等共存。从文明的共通性而言，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文明能够实现交流互鉴的理念指引。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切实回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期待和共同诉求，为国际社会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提供了可信的价值纽带。从文明的发展性而言，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是实现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容源泉。文明凝聚过去、连通未来，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精神命脉。让先辈留下的文化遗产薪火相传，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文明交流互鉴既要继承发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不断吸纳时代精华。从文明的实践性而言，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是实现文明交流互鉴的路径方法。“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人文交流是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的重要桥梁，是增强国家间理解和信任的重要纽带。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 徐 步 邢丽菊

全球文明倡议根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蕴含着开放包容、和谐共生的基本特质。在中国先哲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可取之处，要以虚心的态度来学习并丰富自己。《楚辞》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就需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态度。《周易》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二者并非代表对立，实为一种互补、对应和包容的关系。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指出，中国人倾向于把对立双方看作包容互补的关系，而西方人则习惯于强调二者的冲突。“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和谐共生精神的集中体现。“和，相应也”，中国古人常常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等关系的范式。“和”之所以如此重要，因为它是生成万物的必要条件。“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不同的事物相互调和、融合才能生成繁盛的新事物。中华文化中的“和”包含和平、包容、开明、开放等多重内容，要求既肯定事物的多样性，又包容事物的差异性，并将不同的事物融合到一个和合体中。差异性万物生长的前提，多样性的调和是万物生生不息的基本条件。追求不同文明的和谐发展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历史上的古丝绸之路极大推动了中国与沿线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宗教文化的相互交流促进了中外民众精神信仰层面的融通，为丝路贸易的和平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球文明倡议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

中国式现代化主张从历史长河中把握文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功能，并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

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为人类现代化绘就了宏阔图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确立，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国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极大丰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基本内涵。“两个结合”作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性认识的理论升华，不仅充分彰显了中国实际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为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遵循。全球文明倡议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以宽广胸襟实现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吸收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以团结化解分裂、以合作回答对抗、以包容代替排他，打破了西方中心论主导的文化霸权话语体系，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图景，拓展了人类文明发展

进步的广阔空间，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全球文明倡议对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冷战思维阴魂不散，各种文化思潮激流涌荡，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地缘政治冲突日益加剧，“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沉渣泛起，加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严重阻碍了国际社会交流与合作。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社会以意识形态划界、大搞阵营对抗的冷战思维以及以“价值观”为名划分敌友、拉帮结派的做法，给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繁荣与进步带来巨大阴影。全球文明倡议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文明交流互鉴的普遍诉求，推动并引领文明包容共存的前进方向。文明交流互鉴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增进

了解、建立互信、构筑友谊、加强合作的应有之义。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其文化血脉，每个国家都有其文明渊源，这是决定一个国家价值取向的重要源泉。世界因有不同的文明而丰富多彩，同样因有不同的文明也容易产生隔阂。习近平主席指出，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世界上有多种文化和文明，都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要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欣赏它们形成的多彩之美，这需要既坚持自身文明传统，又对其他文明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只有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开展不同文明对话，才能消除因文化差异而带来的隔阂，才能避免落入文明冲突的陷阱，才能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正能量。

全球文明倡议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一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有力支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理论贡献，为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正确方向。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动力，文明是发展与安全植根的沃土，发展与安全又是文明演进前行的途径。“三大倡议”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共同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反映了中国对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深邃思考。全球文明倡议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凝聚精神共识，强化认同纽带，增进理解信任，进一步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夯实了文化根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了新的文化路径。

（作者分别系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 于 江 陈文兵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诸多著名假设中，很少有产生就被公认为谬误并饱受批评的。“文明冲突论”恰恰就是一例。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际关系进入新阶段，国际政治也随着冷战结束成为一门“显学”。学界不再满足于研究解释单个事件，不再习惯性地以意识形态划界线，而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国际格局和人类社会走势。在为世界指点迷津、预测方向的新观点、新理论大量涌现之时，也有人在为谋求单极独霸的美国寻找新的对手和攻击目标。“文明冲突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板下，由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亨廷顿提出。

（一）

1993 年 6 月，亨廷顿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未来的文明冲突也就是西方同其他地方冲突》的文章，提出“文明冲突论”；在同年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文明的冲突？》进一步阐发其核心观点；在同年《外交》季刊 11—12 月一期上著文《不是文明又是什么？》回答各国学者的大量批评、质疑。3 年后，他又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系统论述“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的要义有三：一是人类历史新阶段中仍然会有冲突，主导人类冲突和纷争的因素将是文明文化上的差异；二是文明文化之间的差异不

仅实际存在，而且具有根本性；三是经济全球化与地区化，助推文明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也增大了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亨廷顿在提出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明确站在西方立场。他认为，来自非西方的、对处于权力顶峰的西方的挑战不断增长，文明冲突的概率在大大增加，并得出结论：未来主要的全球性冲突将在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 and 集团之间展开，“在这个世界上，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美国主流学界也对其持批评立场，该论调出台后的美国历届政府出于政治正确，也从未承认其政策价值。但另一方面，就有一些人出于特殊需要，不时祭出这个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的论调。

（二）

从国际学术界来看，文明冲突论的抛出，有对久居国际关系理论学术主流，且正处于低潮期的现实主义学派“趁火打劫”的味道。研究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者因没能预测到苏联解体 and 冷战结束而一度气势顿挫，此时面对亨廷顿借“文明冲突论”夸大文明和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顿时群起而攻。与此同时，欧盟国家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和超主权联合的推进，逐渐兴起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使得这场“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分析模式”是否能继续的论战稍显混乱。持进步主义观点的学者则针对亨廷顿片面强调不同社会和文明之间的抵触与对立情绪提出，经

济全球化、通信现代化扩大彼此交流和利益融合的作用如何评价？人类面对越来越重大的共同挑战是独自面对还是形成合力和共同文化加以应对？面对这些问题，亨廷顿本人及“文明冲突论”的拥趸从未着眼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把文明文化作为重要变量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本来是学术问题，而且对国际政治理论的深化拓展甚至别开生面大有益处。其实与“文明冲突论”大致同期，西方国家关于文明与国际关系的思考和假设是丰富多彩的。以英国学派的巴里·布赞为代表的文明分治论，主张不同文明可以在不同地区发挥主导作用。例如，东亚文明圈主要核心理念是由儒家思想构成，中国在区域层面的多边治理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文明分治论的缺陷在于突出了文明间差异，对不同文明达成共识持悲观态度，忽视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流促进的作用。以美国政治学家卡赞斯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文明融合论，认为世界存在不同文明，文明并没有优劣之分；不同文明相互接触一定会相互促进，取长补短；批驳文明冲突论，认为美国社会内部的差异和冲突并不亚于美国对外的冲突；反对文明分治论，认为在全球化环境里，世界最终会形成一体，走向共识。对文明间关系的看法是分治、融合还是冲突，首先反映的是学者个人的世界观、文明观。但亨廷顿基于自己充满谬误的理论假设，强调冷战后世界政治冲突的主线将是“文明的冲突”，无论从理论建构本身还是从政策实践影响看，都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把错误理论假设捡起来并不时加以滥用者。这些人对为世界注入积

极、稳定、建设性力量没有作为，一门心思为维护自身霸权而歧视打压他人，不择手段地干扰他人发展，为此不惜重拾冷战思维、煽动意识形态对抗和全球阵营对立。

（三）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日趋严峻，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更加严重。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量子卫星、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人类的生产力、创造力日趋进步，人类生活的关联和不同文明的交融前所未有，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如果秉持“文明冲突论”甚至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重拾冷战思维，不同国家可能为了争权夺利恶性竞争而兵戎相见，从而带来灾难性危机。只有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各国才能顺应时代潮流，响应世界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声，把巨大的合作潜力化为无穷的发展合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大力弘扬正确的文明观，认真鉴别和抵制错误思想与险恶用心。如同亨廷顿牢牢站稳西方立场一样，“文明冲突论”植根于“西方中心主义”，顺应了美西方某些人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零和博弈思维，被应用于遏制中国等新兴国家发展，使所谓非西方国家长期在国际体系中处于无权 and 弱势地位的

战略图谋。但这这一论调产生以来已在国际社会制造大多矛盾冲突，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宁，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让霸权主义者自己都感到树敌太多、吃不消了。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世界上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 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人类文明存在差异，我们要顺应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大力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切实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开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今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一重大倡议为世界不同文明实现包容共存，开展交流互鉴贡献了中国智慧。世界各国应当着眼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局和人类文明赓续的全局，共同把握人类文明演进基本规律，携手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大力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深入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等创新性举措，大力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共同推动各种文明和谐相处和人类文明不断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